

烟雨山房

文学思想研究

李思涯○著

胡应麟最为著名的著作是《诗薮》，共20卷，分内外两编。内编是分

盈全新之结尤。其诗歌、乐舞，可见胡也舞者矣。用事，完整理论体系，由以下三个方面：除以情景为诗歌模写之对象，用事亦另一之重要，即用事之偏差失误，将情、景、事三者联系，以“以”风调，“一种韵”为用事之极标准。



文学思想研究

胡应麟

李思涯○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应麟文学思想研究 /李思涯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 - 7 - 5161 - 0853 - 6

I. ①胡… II. ①李… III. ①胡应麟(1551~1602)—文学思想—研究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241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张 辉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7.25

插 页 2

字 数 389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蒋 寅

千帆先生不给学生的博士论文作序，只有曹虹师姐的《阳湖文派研究》是个例外。我也不给自己指导的博士论文撰序。导师对学生有学术责任，王婆卖瓜，说甜是自夸，好坏还是由学界公断罢。思涯的博士论文不是我指导，不在程限之内，可以写几句感言。不只谈研究的内容，也聊记师生之缘之谊。

2002年，文学所各专业硕士生考试成绩都不理想，及格者很少，研究生院转来一批调剂试卷，系里嘱我负责筛选，我挑出若干考分高、年纪轻的考生复试。笔试是一段涉及清初唐宋诗之争的文字和卞之琳《断章》的分析，各专业通用。原分别投考现代文学、文学理论专业的李思涯和张广绍，最终被我录取，研究方向是中国诗学。面试时，思涯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真率的性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在课堂上他也是发言最踊跃的，总能提供出与自己思考不同的看法，我很欣赏。这是做学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在任何时候都坚持独立思考，不轻易接受成说。

我指导硕士生，通常都选一两种书带他们读，一周半天，诸生轮流讲读。那些年我还不像现在这么忙，师生的接触比较频繁，关系也很亲密，三年下来，亦师亦友。思涯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正直，性格爽朗，反应敏捷，思维清

晰，同时有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考虑到他夙有志于研究现代文学，硕士论文就建议他研究中国诗学言说方式的现代转型。这是个涉及近代文化史、文学史、翻译史、出版史和中外学术交流史多个学术领域的课题，很难下手。他多方搜集资料，最后写出一篇六万多字的论文，虽还不能说很全面、深入，但已从多个角度对问题做了有见地的阐述。通过论文写作，也掌握了处理文献的方法，培养了初步的研究能力。随后他考入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其间修习不同学科的课程，受到多位名师的熏陶。陈国球教授细致绵密的工作作风、陈建华教授古今贯通的学术视野，都给他很大的影响。他寄给我看的几篇课程作业，无不有见解有新意，足见理论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较大的提升。士别三日，真当刮目相看，我深为他的成长和进步而欣慰。

这部《胡应麟文学思想研究》是思涯的博士论文，在陈国球教授指导下完成。国球先生是胡应麟研究的开拓者，在1986年就出版了《胡应麟诗学研究》，对胡应麟与明代格调派的诗学作了很好的阐释。但胡应麟作为继杨慎、王世贞、焦竑之后明代最渊博的文人，从思想史和文学史的角度看，仍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作为学者，胡应麟如何看待经术与文学、博学与辞章的关系？作为正统文人，胡应麟如何对待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作为诗人，胡应麟如何认识文章写作？作为格调派的一员，胡应麟如何理解和把握“格调”概念？身兼学者、作家和批评家，胡应麟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点？出现于明代晚期的胡应麟的文学思想，在文学史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些问题，正是需要思涯研究并思考的。在这部论著中，他不仅一一回答了上述问题，而且回答得非常好。精致的梳理和分析，显示出良好的学术训练和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抓住了明代中期以降士大夫群体在经术和辞章上的分化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学术思想、文学思想问题，从明代学术与文学的互动来阐述胡应麟文学思想的渊源、特征和丰富内涵，提纲挈领，立意广大。不仅于胡应麟研究发覆良多，对文学史上的一些传统命题也有独到的剖析和开

序

掘。其思考的穿透性及所带来的理论启示，意义已远远超出胡应麟研究的范围。

但思涯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做博士后研究期间，继续扩充修订这部论文。经过几年的磨砻，思路更加完密，细节也有所充实。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胡应麟文学思想研究》，已是一部论述详赡、新见迭出的学术专著。书中提出的明代中叶学术与文学的分途，我认为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我们把握和理解明代思想、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书中各章节的论述也足以充实文学思想史、批评史和学术史的论述，为学术界所采信。

胡应麟是明代后期学术史、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的《少室山房笔丛》是明代少有的内容丰富、学识渊博的笔记；而《诗薮》更是明代数一数二的淹贯古今、见识不凡的诗话。近年有关胡应麟研究的专著已出版了两种，但对胡应麟诗歌史论、诗歌批评方面的研究仍不多见。我一向觉得，《诗薮》是格调派诗学的集大成著作，明前后七子辈对古、唐诗的用心揣摩，成果主要凝聚在《诗薮》中。胡应麟见识的通达，使他并不像同时代许多诗家那样，囿于唐诗一途，他也留意宋元及当代诗歌，上下古今，不乏心得。他的许多论断都影响到后人的看法，首当其冲的便是许学夷《诗源辩体》。

当年我带思涯他们读《诗源辩体》，曾提到这一点，并深以《诗薮》无人笺注为憾。后来思涯告诉我，他跟从陈国球教授做《诗薮》笺注，让我很高兴。这项工作将为研究胡应麟的诗歌批评提供很大的便利。事实上，思涯在笺注过程中，广泛参阅明代诗学文献，已对胡应麟与明代唐诗学不断形成新的认识，陆续写出《王维七律的历史论述》、《论明代复古派对杜诗的态度》等论文。看得出他的学术视野在不断扩展，对古典诗学的见识在逐渐深化。一个学者的知识和判断力正是这样形成的。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专精，都涉及许多相关知识，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又引发新的问题，新的研究，就像投石于水，波纹一圈圈扩大。

庄子有言，吾生有涯，而学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岂不殆哉？然而孔子

又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个学者，苟能以学启其思，更以思运其学，则有涯即是无涯，无涯亦可有涯。偶读袁枚《与杨生书》，“仆如生年时，绝不如生；然则生如仆年时，岂止胜仆也？”大概古今为师者，深心无不存此冀望。值思涯第一部专著行将授梓，欣悦之余，走笔为述所感。思涯勉旃。

2012年2月25日于岭南大学

目 录

序	蒋 寅(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文学思想研究	(1)
第二节 胡应麟文学思想研究	(12)
第三节 近年胡应麟研究综述	(17)
第二章 明代士人的分化与博学的思想史意义	(30)
第一节 明代士人的分化	(31)
第二节 理学之“博约”与知识之“博学”	(45)
第三节 小结	(57)
第三章 胡应麟关于“文章”与“学问”的论述	(58)
第一节 “道”、“文章”、“学问”关系的变化	(58)
第二节 学问家意识与心态	(77)
第三节 诗文正统与学问家意识	(99)

第四节 小结	(102)
第四章 胡应麟诗学思想	(104)
第一节 诗歌发展的内外部因素	(104)
第二节 “格”“调”的含义与功能	(133)
第三节 “格调”的含义与功能	(182)
第四节 格调、风神与复古、博学	(207)
第五节 胡应麟诗学思想小结	(232)
第五章 复古派文章论与胡应麟文章思想	(235)
第一节 文道分离	(235)
第二节 从“六经皆史”到六经皆文	(247)
第三节 文道关系理解的平庸状态	(250)
第四节 小结	(258)
第六章 胡应麟小说思想	(260)
第一节 胡应麟与小说	(261)
第二节 “小说”辨体	(264)
第三节 小说之“虚”与“实”	(271)
第四节 小说地位	(284)
第五节 小说之功能	(287)
第六节 小说流传及其与时代特点	(295)
第七节 小说与诗文、戏曲之关系	(302)
第八节 小说研究的考证态度	(308)
第九节 关于演义小说	(311)
第十节 小结	(317)

目 录

第七章 胡应麟戏曲思想	(319)
第一节 胡应麟身边的戏曲	(320)
第二节 戏曲之本质	(324)
第三节 戏曲的地位	(330)
第四节 以《琵琶》与《西厢》之讨论为例	(338)
第五节 学问家心态	(349)
第六节 戏曲源流与本事考辨	(353)
第七节 戏曲脚色的考辨	(363)
第八节 小结	(367)
第八章 胡应麟文学思想在明清的意义	(369)
第一节 “时代”、“气运”制约之下不同选择	(369)
第二节 “博学”的意义	(383)
第三节 “博学”观念对明末清初的影响	(393)
第四节 小结	(402)
第九章 结论	(404)
参考文献	(413)
后记	(423)

第一章 絮论

既然说“文学思想研究”，显然是站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而论。因为：何为“文学”、何为“思想”，古今不同；就“文学思想”这个术语本身而言，是以“文学”为中心，还是以“思想”为中心，当下亦有不同意见。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思想”？“文学思想”的研究与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完全相同？“文学思想研究”的意义到底何在？

目前为止，学界以“文学思想”为题对于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专著已经不少，但从理论层次上进行的探讨并不多。以笔者所见，罗宗强、包弼德（Peter K. Bol）与葛兆光对文学思想研究的理论探讨最富有启发意义。本书以上述问题为思考的起点，以上述几人的观点为参照，以“胡应麟文学思想研究”为个案，继续探讨有关文学思想研究的问题。

第一节 文学思想研究

一 “文学”思想研究

罗宗强在1986年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引言》中指出，文

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里，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此时，罗宗强强调的重心是：“只有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放在一起研究，才有可能较好地说明文学思想的发展面貌，较好地探讨文学思想的发展规律。”^① 此后，罗宗强在为1995年出版的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所做的序中，详细谈论了对文学思想的看法。罗宗强认为，文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文学的特质、文学功利性、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体裁的探索、风格韵味情趣的追求、方法与技巧的选择、修辞与声律的运用、文学的承传关系，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种种看法，都属于文学思想史所要研究的范围。罗宗强指出，文学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要比文学理论批评史更为广泛，文学思想除了反映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中之外，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里。文学史研究文学现象本身，而文学思想史则研究文学现象所反映的文学思想。^② 罗宗强强调了文学思想研究的独立性，为文学思想研究论证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2001年，罗宗强为张峰屹的《西汉文学思想史》做的序中称，从《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到正在进行的《明代文学思想史》，自己回避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文学？罗宗强认为，文学思想的产生，显然是在有了文学创作之后，是文学创作的经验的总结。因此，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不解决，什么是文学思想的问题也就无法圆满地解决。^③ 将文学思想研究的问题回归到最原本的问题——什么是文学。

罗宗强的这一研究方法，在传统的文学批评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之外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引起学界很大反响。^④ 按罗宗强思考路径，“文学思想大量

^① 罗宗强：《引言》，《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② 罗宗强：《序》，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1页。

^③ 罗宗强：《序》，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④ 傅璇琮、陈允吉、日本九州岛大学《中国文学论集》、周国林、吴相、叶振华、王蒙等都给予很高评价。另见张峰屹《罗宗强先生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中文自学指导》2003年第2期；张毅：《罗宗强先生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阴山学刊》2002年第4期。蒋寅：《文学思想史：视角与方法——重读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书品》2004年第2期，在若干年后重评仍给以很高评价。

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文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到罗宗强将问题回归到“什么是文学”的时候，文学思想研究关心的重心无疑都落在“文学”之上。此时，“文学”是文学思想研究的核心。这个路径也被目前的文学思想研究认同，所见的文学思想研究都以“文学”为核心进行研究。这样的文学思想研究以“文学”为根本，即“文学”思想研究。

二 文学“思想”研究

不过，要思考的是，文学思想研究是否可以是以“文学”为媒介的思想研究，即文学“思想”研究呢？

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① 即是这样以“文学”为媒介的思想研究。包弼德讨论唐宋之间中国思想与文化传统出现的转型，不满意以往哲学史的叙述，认为哲学史的叙述方法是由于新儒学的重要性而后设的，“哲学史并不总是代表思想文化的历史，或者能充分地描述和解释我们借以建立共同价值观的那些方式。”^② 包弼德有意改变思想史的写法，一反以前哲学史与思想史的一般讲述方法，而以文学史为主要线索来讨论唐宋思想的转变。比如讲到唐代的古文运动，他说：“古文运动是一场思想运动，它将文学的转变视作是对公共价值观转变至关重要，它的主要‘思想家’是文人（literary men）。在我看来，唐代的思想文化仍然是一种‘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在这种文化中，学术是以在文学广阔领域中的著作的形式出现……文学写作是把学、价值观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最常见方式，改变人们的写作方式是影响

^① 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文译本见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第 7 页。

思想价值观最一般的方法。”^① 对于宋代的思想变化，包弼德主要是以文学家欧阳修、苏轼、晁氏家族等为讨论对象。这种把文学现象作为思想研究的路径无疑对文学思想研究有很大启发。文学思想研究既然说是“文学思想”，在作为“文学”研究的同时，它也应该是思想史的一部分。因此，是否可以把以“文学”为重心的文学思想研究与以文学为途径的“思想”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进行“文学思想”研究呢？

三 文学思想与思想史的沟通：士人心态与身份变化

罗宗强在文学思想研究中强调的一个重要层面很值得重视，即士人心态的变化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早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罗宗强就提出，一种文学思想经历萌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外部原因，包括政局的变化，士人心理状态的变化，哲学思想的影响，社会思潮、生活习俗的变化，文化交流的影响，以至重要的批评家、理论家的素养与性格等。^② 在对整个唐代文学思想做了研究之后，罗宗强总结出几个理论问题，其中之一即是：“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政局有关。但是它与政局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士人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的。政局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士人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③ 罗宗强为了强调士人心态的变化对文学思想的影响，1991年出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④ 重心就放在了说明玄学思潮与士人心态变化的关系，探讨士人心态的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审美情趣，如何影响他们文学题材的选择，如何影响文体的演变。从这个视角，对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作家的创作重新审视，对西晋诗风与东晋玄

^①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第29—30页。

^②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5页。

^③ 同上书，第470页。

^④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言诗作出了新的阐释。1995 年为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做的序中，又称：“我以为，影响文学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思潮和士人心态的变化，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往往左右着人们（特别是士人）的生活理想、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响文学思想演变最重要的还是古人心态的变化，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最终还是通过士人心态的变化来实现。文学毕竟是人学，描写人的生活、人的理想、人的心灵，社会上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心灵才能流向作品。心态的变化在文学思想演变中实具关键之意义。”^① 左东岭提出，士人心态研究的难点在于研究者须具备文史哲的广博知识背景与融贯能力。这不仅是指要弄清一个时期的历史状况而需要阅读经史子集的几乎全部材料，更重要的是还要具有独立研究相关领域的学术问题的能力。^②

所谓社会思潮和士人心态的变化，扩大了来说，就是思想史的研究。而包弼德进行的正是这样的研究。

包弼德在以文学史为线索讨论思想史时，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士”的转型。讨论唐宋思想的转型，不以“儒”而以“士”为思想史的主角，是因为包弼德试图改变通常的思想史的叙述方法。包弼德认为：“将‘儒士’和‘儒学’作为表示中国政治精英和他们的价值观的一般概念来使用，模糊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以及时代之间的变化。”“由于在学的方面存在文与儒两种角度，这促使我拒绝将所有的士归为儒生，以及将所有的士学归为儒学。”^③ 也就是说，包弼德提出了一个重要区别：“士”与“儒”并不等同。在谈论“士的转型”中，包弼德试图回答：为什么作为世家大族的士，在隋唐以前的那些王朝衰落之后能维持下来，却不能度过唐朝？为什么士在北宋早期，作为有学

①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第 8 页。

② 左东岭：《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文学评论》2004 年第 3 期。

③ 《斯文》，第 16、19 页。

养的文官官僚这样的国家精英再度出现？为什么在有宋一代，士变成作为地方精英的文人？^① 包弼德认为，变化的轨迹是从唐代的以门阀为中心的世家大族，到北宋的以学者—官员为代表的文官家族，再到南宋的文人为中心的地方精英。包弼德说：“作为一个描述社会成分的术语，‘士’在唐代的多数时间里可以译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译为‘文官家族’，在南宋时期可以译为‘地方精英’。”^② 可以发现，包弼德讨论的“士的转型”与罗宗强讨论的士人的心态的变化，在某个层次上有共同点，都关注士的某种变化。但是，二者又有所区别。罗宗强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与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③ 侧重的重心是士人心态研究，而包弼德强调的是士人身份的变化与分化。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士人转型、分化之后，才导致士人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士人心态作用于不同的文学，才构成丰富复杂的文学思想史。所以，研究明代的文学思想，需从包弼德讨论的“士的转型”思路再折入罗宗强侧重的士人心态，才能将问题讨论得更加清晰。

从士人身份变化与心态考察出发，继而进行文学思想研究，可能存在一条途径，这条途径可以把“文学”思想研究与文学“思想”研究结合起来。如此一来，文学思想研究就不仅仅是一种改变观察视角的研究，而是一个打破文学研究、思想研究学科界限的方法。

四 “文学”“思想”研究的可能性

若说以罗宗强的研究方法进入明代文学思想的研究，可能不会引起太多质疑。但若将包弼德以文学史切入思想史的方法加入“文学”思想研究，以与文

^① 《斯文》，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4、37页。

^③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学“思想”研究配合，来探讨明代的思想史，则会引起质疑。包弼德的方法已经受到葛兆光的质疑。

虽然葛兆光承认包弼德是相当敏锐的，但反问：“文学史上以文辞表达情感即文学性表达见长的作者，是否可能与思想史上以思想性表达的作者完全重叠，并充分表现那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变迁呢？”“文学史的线索作为主线，又怎么能够说明在社会全部领域中的士的意义和思想文化变迁？”“观念提出者可能超越时代，天才的想法往往通过文字表现，特别有赖于敏感的文学家的先知先觉。但是，整体社会的转型，常常需要观念的世俗化和制度化才能实现。”“很多被‘文学史’看来是‘边缘’的或者是‘无关’的思想现象，就不大容易被当做思想史的‘背景’而考虑进思想史复杂的历史中去，一些与文学或文学家无关的数据与文献，也不能进入思想史视野，毕竟文学史不是思想史。”^①葛兆光的这一质疑是基于其“一般知识、思想”的思路。葛兆光说：“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②“我所说的‘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的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一些不言而喻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简明、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

^① 葛兆光：《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250页。

^②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